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吳越春秋全譯

(修訂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漢〕趙晔著 張覺譯注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吴越春秋全译

(修订版)

[汉]赵 晔 原著 张 觉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春秋全译/张觉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9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ISBN 978-7-221-08202-2

I. 吴… II. 张… III. ①中国-古代史-吴国(? ~前473)②中国-古代史-越国(? ~前306)③吴越春秋-译文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3436号

书 名	吴越春秋全译
著 者	[汉]赵晔
译 注	张觉
责任编辑	赵泓
特约编辑	王培德
装帧设计	余强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357千字
印 张	24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36.00元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化的进程中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灵魂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前言

《吴越春秋》一书,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而重在叙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故事。该书虽大量取资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但并不拘泥于此,而又采摭掺入了不少佚闻传说,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塑造之辞;同时,它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注意写清其来龙去脉。所以,从它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是一部史书;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不但后代的史籍方志,如《吴郡志》之类,常取资于该书;就是后代的文学作品,如唐代的说唱文学《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代传奇梁辰鱼的《浣纱记》、明清历史小说冯梦龙、蔡元放编的《东周列国志》、近代的《吴越春秋说唱鼓词》、现代曹禺创作的话剧《胆剑篇》、萧军所著的《吴越春秋史话》等,都或多或少地取材于该书。所以,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

一、《吴越春秋》的作者

据史载,赵晔著《吴越春秋》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赵晔的生平事迹,史载甚略。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可知^①,赵晔字长君,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做过县里的小吏,曾让他去迎接郡里来的督邮^②。由于他禀性清高,不愿阿谀奉迎,所以弃职不干,到犍为郡资中县(今四川资中)去向当时的经师杜抚学习《韩诗》,潜心于学问,一连二十年也不捎个信回去,家里的人还以为他死了。杜抚死了以后他才回家,州里召他做官,他仍未就职,曾被选举为有道徵士。他的著

作首推《吴越春秋》，但《诗细历神渊》更为当时的学者蔡邕所赏识，以为胜过王充的《论衡》。据《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他还著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但隋、唐时就已亡佚了。史籍未载其生卒年，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其事迹稍加推断。他年轻时即抛弃县吏之职不干而就学于杜抚，当在二十岁左右。在杜抚处二十年而杜抚死，当在四十岁左右。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杜抚“建初中（公元76—83年）为公车令，数月卒官”。算他死于公元80年左右，由此上推，赵晔当生于公元40年（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前后。他的书曾受到蔡邕（公元132—192年）的推崇，想必在他死后不久，由此推测，他可能卒于公元130年（汉顺帝永建五年）前后。这些推测虽然不一定精确，但他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之时（公元58—125年），恐怕是可以肯定的。

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著录，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是十二卷，而现存的《吴越春秋》却只有十卷，有些本子还将它合为六卷，可见今传的《吴越春秋》已不是赵氏的原著了。《隋书》又著录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十卷。《唐书》也载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烦》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这些著作与赵晔之作是否有关呢？《崇文总目》卷三在著录了“《吴越春秋》十卷”与“《吴越春秋传》十卷”之后加按语说：“唐皇甫遵注^③。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卷^④。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此说若是事实，则赵晔、杨方、皇甫遵三家之作虽不相同，却也有联系。而流传至今的《吴越春秋》十卷，应该是皇甫遵的考定本。虽然它的原著者是赵晔，但经过杨方的刊削与皇甫遵的订正，早已不同于原著了。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赵晔所撰”。这种情况，与《东周列国志》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东周列国志》的作者被题为“蔡元放”不太妥当而应题为“冯梦龙、蔡元放”，那么《隋书》将十卷本的《吴越春秋》题为“皇甫遵撰”也就不太妥当而应该改题为“赵晔、皇甫遵撰”。为了依从全译丛书体例，今姑题为赵晔原著。

据《崇文总目》之说而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否能成立呢？后人议论纷纭。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完全承袭《崇文总目》之说。

徐天祐则认为今传之十卷本为赵晔所著,杨方、皇甫遵之书已不传^⑤。

杨慎则对传世的《吴越春秋》之作者表示疑问。其《丹铅余录》卷十四说:“《汉书》:赵晔撰《吴越春秋》。《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行,晔耶?方耶?”

胡应麟则认为今本为赵晔之作,而非杨方之作。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五《丹铅新录一》中说:“案隋、唐诸《志》。杨方所撰名《吴越春秋削繁》,南渡尚存见。《通考》盖以晔所撰太繁,故芟削之,若刘孝标《九州春秋钞》之类耳。夫东京、六代文体迥异,即二书并行,岂能惑具眼哉?”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完全承袭杨慎之说而不加论断。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今传十卷本为皇甫遵之书^⑥。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认为今传十卷本是杨方之作^⑦。

今传《吴越春秋》十卷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我认为应该题为“赵晔编著、皇甫遵删定”。

说“赵晔编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杨方、皇甫遵的《吴越春秋》,都不过是在赵著的基础上加以删削、考定而成的。所以,今本即使最终出于皇甫遵之手,也不能将赵晔排除在作者之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只题“赵晔撰”。因为今本实非赵氏原著,它与赵氏原著相比,不但被删削了,而且也被改动了不少。这从古代类书与注释的引文中可以得到证实。

我之所以不把杨方当作为今本的作者之一,是因为:《晋书》卷六十八《杨方传》说他“著《五经钩沉》,更撰《吴越春秋》”,这所谓“更撰”,不过是改编而已,究其实,也就是《崇文总目》所说的“刊削”。其书在当时可能是以《吴越春秋》为书名而行世的,所以《晋书》只说他撰《吴越春秋》。但当时赵晔的十二卷本同样流行,正如胡应麟所说,它是不能“惑具眼”的。所以《隋书》《唐书》的编著者在著录时就不再承袭《晋书》而正其名为《吴越春秋削繁(烦)》。杨方既然以为赵书烦而大加芟削,恐怕是不会再作什么增补的。就是说,他的书不过是赵书的删节本,其中并没有他的创作成果。所以,我们不应该将他视为《吴越春秋》的作者。有人以为杨方对赵书有削也有增^⑧,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崇文总目》所谓“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恐怕也只是指

取赵晔之书、参照杨方的删削方法加以删定而已。就是说,杨方之书不过是皇甫遵考定时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不是一种原材料。皇甫遵的十卷本,根本不是简单地将杨方的五卷析为十卷、再去其“削繁”之名而成的。他的十卷本,应该是一种较赵书为简而较杨书为详的本子,所以皇甫之书一流行,杨方之书便无甚价值而渐渐地失传了,而绝不是后人将杨方之书改题为“赵晔撰”。

我之所以要把皇甫遵当作今本的删定者而著其名,是因为今传之十卷本实即皇甫遵的考定本。它们的卷数相同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另外,皇甫遵本是一种注本,所以《唐书》将《隋书》的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十卷正名为《吴越春秋传》十卷。大概后来的本子删去了他的注,所以又转题为赵晔撰,但其中却不免残留下皇甫本的痕迹。顾广圻、蒋光煦都曾见到过影宋钞本十卷。蒋光煦虽说它“无注”,但从他的校记中可以看到,宋本还残留着一些注释。如卷三:“胥乃贯(‘乌还切’三字,宋本原注)弓执矢。”卷四:“会楚之白喜(宋本有注云:‘上音伯,下音豁。下文同。’)来奔。”卷六:“化为黄能(宋本有注云:‘囊来切,鳖三足。’)”^⑨。这说明,题为赵晔撰的宋本十卷,实出自皇甫遵“考定而注之”的本子。《宋史·艺文志》著录了“赵晔《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两种本子,其间的区别恐怕只在于注释的有无,其原文恐怕是一样的,即都是皇甫遵考定的十卷本。皇甫遵在考定时,将赵氏的十二卷本删削改动了不少,这一点已为古代类书及古注的引文所证明。所以,宋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如果不题“皇甫遵删定”而只题“赵晔撰”,就不能反映出该书作者的真相和全貌。因此,皇甫遵应被看作为今本《吴越春秋》的准作者而著其名。

末了需补充说明的是,古代凡抄撮旧史、删削他书、考订校注等皆称“撰”,所以,赵晔抄撮《左传》《国语》《史记》以及传闻异说被称为“撰”,杨方删削赵书也被称为“撰”,皇甫遵考定赵、杨二书而加注也被称为“撰”。但真正要确定其作者,是不能不作具体分析的。

二、《吴越春秋》的流传

《后汉书》卷七十九载赵晔“著《吴越春秋》”,可知该书成于东汉。《晋书》卷六十八载杨方“更撰《吴越春秋》”,可见此书到晋代又有了改编本。据《隋书》《唐书》以及郑樵《通志》卷六十五的著录,可知在

隋、唐、北宋期间,此书有三种传本,即赵晔的原本十二卷,杨方的删节本五卷,皇甫遵的参定注释本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著录了“《吴越春秋》十二卷”,并说:“右后汉赵晔撰。吴起太伯,尽夫差;越起无余,尽勾践。内吴外越,本末咸备。”可见南宋初年赵氏的原著尚存。《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史记》注、《太平御览》等引文有不少不见于今本,也可说明唐、北宋时期赵氏的十二卷本并未亡佚。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未著录此书,《宋史》卷二百三也只载“赵晔《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由此可以推知,赵晔所著的十二卷本及杨方所芟削的五卷本在宋末元初都已经亡佚^⑩,剩下的就只有皇甫遵删定的十卷本了。清代顾广圻曾见到过影宋钞本,并在乾隆甲寅(公元1794年)九月用它校过明刻本;蒋光煦也曾利用影宋本校过^⑪。从他们的校记中可以知道,宋本是十卷本,文字与明刻本稍异,仅有极少几条注释。但这种影宋本现在也早已亡佚了。

《吴越春秋》现存的最早刊本,是元大德十年丙午(公元1306年)绍兴路儒学刻明修本。这是元代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支持刊刻的,由前宋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祐作序,并加考订音注^⑫。该书今藏北京图书馆^⑬,恐怕是孤本了。今未见该书,难以评论。但该版既在明代修过,恐怕与元代的原刻本不尽相同了^⑭。但该本与其他翻刻本相比,无疑是值得珍视的。元代的大德刻本对《吴越春秋》的流传影响极大,后世的刻本都源自大德本。

明代有好几种刻本,其中最能体现大德本风貌的有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邝廷瑞、冯弋的刻本^⑮,该书共十卷而又分上、下。该本现存虽已不多,但上海涵芬楼1919年辑印《四部丛刊》时影印了此本,所以现在也易见到。此外还有一种明代翻刻十卷本也甚佳。这种本子每半叶9行,每行17字,其刻书年月及刻书人均未标明,所以莫友芝还以为是大德原版的重印本^⑯。其实它只是明刻本。徐乃昌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将它辑入《随庵徐氏丛书》而校刊印行^⑰,其“字画行款,一仍其旧”^⑱,所以也可利用。明代万历丙戌(公元1586年)冯念祖卧龙山房也翻刻过大德本,十卷。该本现存尚多,较易见到,可惜误字甚多。明代除了保留十卷本面貌的翻刻本外,又有人将十卷合并为六卷,即将前三篇合为第一卷,第六、第七篇合为第四卷,第八、第九篇合为第五卷。他们虽然保留了徐天祐的注,却删去了徐

天祐的序以及书末的衔名,文字也多异同。吴琯辑校的《古今逸史》中的《吴越春秋》,何允中辑刊的《广汉魏丛书》中的《吴越春秋》,都是如此。这两种六卷本也为后人所重,后世翻刻影印者不少,其实不足称善。

清代的刊本不少,但大多是六卷本,如:(一)汪士汉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搜罗《古今逸史》残版重加印行的《秘书廿一种》本,其版除卷一至卷五的第一叶有所剜改外,其他与《古今逸史》本同。该书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又重刊过。(二)于敏中等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所辑的《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该本为钞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但现也有影印本可供利用。(三)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也是钞本。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中的《吴越春秋》为十卷本,但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吴越春秋》却与《四库全书荟要》本一样,是六卷本,不知他阁是否抄有十卷本。文渊阁本抄校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虽为孤本,但现已影印,流传甚广。该本虽为御制,但误字却不少。(四)王谟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辑刊的《增订汉魏丛书》本,该本后来翻刻者甚多,有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红杏山房刊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三徐堂刊本,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艺文书局刊本,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等等。除六卷本外,清代也有十卷本传世,如:(一)徐维则光绪廿年(公元1894年)所辑的《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中的《吴越春秋》,该本为稿本,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二)徐乃昌《随庵徐氏丛书》本(见上)。

清亡以来的刊本有:(一)郑国勋1917年辑刊的《龙谿精舍丛书》本,十卷。此本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又用郑氏原版重印过。(二)张元济等1919年编辑影印的《四部丛刊》本(见上)。(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该本据《古今逸史》本影印,六卷。(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据冯念祖本(见上)排印的《四部备要》本^⑨,十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万有文库》第二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六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所辑的《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该书据《古今逸史》本影印,六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六卷。(八)台北世界书局1986—1988年影印的《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六卷。

(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苗麓点校本,十卷。该本以“大德本”为底本,较上述各本之底本为优,但在校点排印中有疏漏,这是很可惜的。

由上所述可知,明代以来《吴越春秋》流布甚广,但其中好的版本并不多,值得称道的当推元大德刻明修本、邝廷瑞本及其影印本(《四部丛刊》本)、明刻9行17字本及徐乃昌校刊本。其他的版本,与大德本的差异就比较多了。

前人对《吴越春秋》的注释工作做得不多,皇甫遵的注本在宋末就已亡佚了,而自徐天祐音注的大德本问世至今近七百年,还未有过新的注释本问世,这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徐注虽解决了不少疑难,但要读通全书,仅依靠他的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三、《吴越春秋》内容概要

《吴越春秋》全书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叙述吴国史事,后半叙述越国史事。

吴国的史事,一直追溯到吴国的开创者太伯的祖先后稷。后稷是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姜嫄在野外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而怀了他,所以生下来就把他抛弃了,但牛马、众鸟都保护他,使他活了下来。他从小善于种植,后来当了农官。他的后代公刘、古公亶父都积德行义,很得民心。古公生太伯、仲雍、季历,古公知道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圣贤,于是想把君位传给小儿子季历。太伯、仲雍心领神会,便借口到江南采药而将君位让给了季历,自己在江南创建了吴国,筑都城于梅里(今江苏无锡县梅村)。吴国传到寿梦之世,国力始强,不但与中原各国时有交往,而且与楚国频频交战。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馀祭、馀昧、季札。寿梦死时想传位给贤德的季札,季札推让不受。于是诸樊、馀祭、馀昧禀承父意,依次相袭(兄传弟叫袭)而不传位于儿子,想最后传给季札,但季札仍推让逃避。结果吴人便拥立了馀昧之子州于,即吴王僚。诸樊之子公子光对此心怀不满。这时,楚国的伍子胥一家由于费无忌的谗毁而遭到楚平王的迫害。伍子胥的父、兄被杀,他立志报仇,先逃到宋国,最后投奔吴国。他深知公子光的心事,就进荐专诸,为公子光刺杀了王僚。于是公子光立为国君,即吴王阖闾。阖闾任用伍子胥,在今苏州一带建造了都城。后来楚国的伯嚭前来投奔,



阖闾也任命他为大夫。由于阖闾又担心王僚之子庆忌复仇,所以伍子胥又进荐要离,设计刺杀了庆忌。伍子胥时刻不忘报仇,便进荐了孙武,并怂恿阖闾伐楚。结果吴军伐楚,楚军大败,楚昭王出逃。吴王攻入楚国国都郢,伍子胥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以解恨。后来楚臣申包胥到秦国哭庭求救,秦国出兵,打败了吴兵,子胥等才回到吴国。这时,原来的太子病死,子胥在夫差的苦求下,便劝阖闾立夫差为太子。阖闾死后,夫差继位。他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放下越国,屡次伐齐,虽在艾陵大败齐军,但已实力大伤,却还以此责备伍子胥,赐属镂剑令其自裁。子胥死后,夫差即使连年歉收,仍然穷兵黩武,伐齐后与晋国在黄池争当盟主。越国乘虚而入,大败吴国太子,攻入吴国。夫差回国后,越国又屡败吴军。最后夫差逃离国都,被围困在秦馀杭山(今苏州市西北之南阳山),向越王求和不成,自杀而国亡。

越国的史事,一直追溯到越国的始祖无余的祖先夏禹。禹是颛顼的孙子、鲧的儿子。鲧的妻子吞了一颗宝珠而怀了孕,结果生了禹。当时洪水泛滥,鲧受四方诸侯之长的推荐而奉帝尧之命治水,未获成功而被流放。禹继承父业,在委宛山求得天书,了解了通水之理,于是奔劳海内,治水获得成功。尧、舜相继去世后,禹即天子之位,大会四方诸侯于会稽山,死后即葬于此。禹以下六世为少康帝,他怕禹庙断了香火,就封其庶子无余于越以祭祀大禹。其后代后来渐渐衰微,结果又有人起来复兴越国,传到元常,便开始强大了。元常之子勾践,因被吴王夫差打败而只得求和,并前往吴国当夫差的奴仆。他在范蠡的参谋下,忍垢受辱,最后终于打动了夫差的侧隐之心而被赦回国。回国后他委托范蠡建城作都,自己则卧薪尝胆,念念不忘复仇。他对外继续讨好吴王,不断送礼;对内休养生息,以增强国力,并和群臣一起谋划攻吴之计。大夫文种献上九术。于是越王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佑;送吴王大木良材,使其大兴土木而耗其国力;将西施、郑旦献给吴王以惑乱其心;向吴国借粟,然后还其蒸过之粟,使吴国种而无收。越王自己则积聚粮食以富国,请处女、陈音教授击剑、射箭之术以强兵。国富兵强之后,越王便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严明法令,然后出兵攻吴,屡次打败吴军,最后迫使夫差自杀,灭了吴国。接着又出兵北上,横行于江、淮之间。其后范蠡出走,文种被勾践赐剑自杀。勾践迁都琅玕,称霸于函谷关之东。勾践死后,传到越王亲,被楚国所灭。

四、《吴越春秋》的文化价值

唐代魏徵等所撰的《隋书·经籍志二》对《吴越春秋》之类的杂史曾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评述。其言云：“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这段评述，既涉及到了作者的编纂意图，也涉及到了作品的文化价值。概而论之，则《吴越春秋》之所以能流传近二千年而不废，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一）所述为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二）虽非史策之正，也可备遗亡；（三）有委巷之说，引人入胜。用现代的话说，就在于它具有思想价值、史料价值、文学价值。

（一）《吴越春秋》的思想意义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倾向于现实的。纵观古代圣哲贤智博达之士的著述，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作为史籍名著之一的《吴越春秋》，也无非如此。《隋书》的评说，不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性评判倾向，而且也切中要害地揭示了《吴越春秋》所蕴蓄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涵。

读过《吴越春秋》的人，恐怕都会被夫差由强而亡、勾践由弱而胜的历史事实引入沉思。这其中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是因为夫差昏庸、勾践明智？夫差暴虐、勾践仁慈？夫差刚愎自用、勾践从善如流？夫差听信谗佞、勾践依靠忠臣？夫差奢侈淫荡、勾践苦心劳身？夫差穷兵黩武、勾践休养生息？夫差民多怨恨、勾践深得人心？……这一问题恐怕都会在好学深思者的头脑中闪现。当然，具体的问题是复杂的。就说暴虐与仁慈吧。夫差将公孙圣暴尸蒸山；令伍子胥自杀后，还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大兴土木，使得民疲士苦，人不聊生，道死巷哭；穷兵黩武，敢谏者死……其暴虐之行，令人发指。但对勾践，他却颇多仁慈之心，尽管勾践有杀父之仇，他也曾立志为父王阖闾复



仇,但天以越赐吴,他却不受;勾践入臣于吴,伍子胥劝他诛之,他却很讲究仁义之道,不“诛降杀服”;见到勾践、范蠡在石室中不失君臣之礼,他颇“伤之”,“心不忍见而欲赦之”;子胥反复劝谏,他“不忍复闻”而赦勾践……其恻隐之心,可谓尽矣。至于勾践,虐杀文种,与夫差杀子胥又有何异?由此可见,决定兴亡成败的关键还不能简单地用某种品性去解释,主要地还应该从其政治上的思想水平、洞察力、辨析力、策略原则等方面去分析。夫差在政治上无疑是幼稚的,他甚至分不清敌我忠谗。他不懂得敌人总是敌人,纵敌者必自殃。他没有深湛的政治洞察力,只为一些表象所迷惑,所以虐杀忠良,放虎归山。他的灭亡实体现了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某些必然规律。而勾践,在政治上显然成熟得多,他虽一心复仇,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但当自量其力而不足以伤吴时,他便忍垢受辱,委屈求全;等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就全力以赴以制敌于死地;面对夫差之使的哀求,他也曾有过恻隐之心,但最终还是当机立断,怒令夫差自杀。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来说,勾践可能会受到以怨报德之讥,但无情的历史却说明,他是政治上的胜利者。这无疑也体现了社会政治规律的某种必然性。本书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复仇精神,勾践伐吴而杀夫差,子胥谋楚而鞭王尸,都是一种复仇行动。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其成败又取决于各自的实力、用人、谋略、民心等一系列因素。本书正是以其具体生动的事例,深刻地揭示了丰富的政治规律,所以通人君子博采广览以酌其要也就是必然的事了。当然,本书也颂扬了太伯、季札的让位之德,但那已是过去的政治观。吴国的谦让传统,早就被公子光谋杀王僚而篡位的政治事实给否定了。本书所述的事迹言论,虽颇违反传统的道德观,但它却惟妙惟肖地从历史事实的演变以及针锋相对的辩辞中揭示了政治的历史演进以及诸多富有成效的政治经验,这也正是其价值之所在。徐天祐说它“可以劝诫万世”;钱福说“是书所载,若胥之忠,蠡之智,种之谋,包胥之论战,孙武之论兵,越女之论剑,陈音之论弩,勾践之畏天自苦、臣吴之别辞、伐吴之戒语,五大夫之自效,世亦胡可少哉?^③”皆可谓是知音之言。

毋庸讳言,本书的思想观念也自有其缺陷。作者身处迷信图讖、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东汉初年,也不可避免地使本书带上了这种历史思想的烙印。书中多次出现以卜日、占梦的方式来进行决策的描写,

不管它是否合乎史实,从其思想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不足取的。

(二)《吴越春秋》的史学价值

《吴越春秋》作为一部世所公认的史书,其直接的价值当然应该是它的史料价值。如果我们将它与今传之《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相对照,就可以明显地感到,该书对吴、越两国的史事记载要比他书丰富得多,而且也更具系统性。虽然书中有些记载不一定合乎史实,如其占日之术“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①,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抹杀它的史料价值。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与《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相印证固不必再加称说,就是那些《左传》等未载的事迹,恐怕也并非都是无稽之谈。东汉初年,去古未远,当时或许有许多杂史与传说可供采录,其中有些材料显然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如《吴太伯传》载太伯“葬于梅里平墟”,不但可与《皇览》等记载相印证,更可为今无锡县梅村乡留存的古迹所证实。还有像《王僚使公子光传》中载专诸杀王僚之前“从太湖学炙鱼”,今江苏吴县胥口乡有炙鱼桥,也可相证;该篇又载公子光迎太子建母于郑,虽与《左传》《史记》的记载不同,却很可能最合乎史实^②。至于《阖闾内传》以下诸篇,其记事十分详赡,更可用来补充《左传》等记载的不足,其史料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③。这一点其实也早为前人所肯定与利用。《隋书·经籍志》说它可“备遗忘”,《史记》三家注引用《吴越春秋》之文来疏证《史记》,现代的学者把其中的弹歌作为探究文学艺术起源的重要史料,即其例。

《吴越春秋》不但具有史料价值,即其体例而言,也颇可称道。作者将《左传》的编年体、《国语》的国别体、《史记》的纪传体熔为一炉,以其丰富的资料,编著了一部十分系统的以纪传为主体、以编年为头绪来铺叙两国史事的国别史。从体例构思的缜密性、系统性来说,它对我国古代史学的贡献也是不容忽略的。

当然,作者对体例的构思虽然很好,但在具体的记载中却往往有年代错乱的情况,有些事迹也明显有违史实^④。我们虽然基本上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但它毕竟是一部杂史,如果毫无鉴别地采用其中的记述来研究当时的历史,那显然也是不适当的。这是我们在利用其中的史料时应加注意的。

(三)《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

《吴越春秋》虽是一部史籍,但它的文学成就却远远胜过它的史学成就。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为世所公认。它作为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者善于选材与构思。他善于从丰富的史料与传说中选取最生动的故事情节加以渲染铺排,同时又充分舒展其想象力,加入一些合乎情节发展逻辑但于史无徵的内容,再通过别具匠心的构思,将它们组织成有头有尾、脉络分明、前后照应的完整故事。这恐怕是人们视之为历史演义的主要原因。例如,在《王僚使公子光传》中,他便以这种方式详尽地描写了伍子胥的身世及其活动。这从史书的角度来说,并不能算是成功之笔,因为这些事迹与吴国的历史并无多大关系。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显然是成功的。后世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描写伍子胥的说唱文学与小说,之所以从《吴越春秋》中吸取得那么多,其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作者对这一段富有戏剧效果的故事情节作了系统、详尽、曲折、生动的描绘。其他像越女试剑,袁公变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伍子胥兴风作浪,孔子进见越王之类,“尤近小说家言”^④,虽无甚史料价值,却是道地的文学作品,可视为六朝志怪、佚事小说之权舆。

其次,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善于从人物的行动、对话、表情、心理等各个方面来展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就拿关系到吴国兴亡的关键人物伍子胥来说,他的亮相,是在楚平王派使者诱捕之时,这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者紧紧抓住伍子胥与伍尚弟兄二人一去一留这种截然相反的思路与决心,从强烈的对比中一下子就刻画出了伍子胥深湛的政治洞察力与“能成大事”的政治素养。接着,作者写他行哭林泽之中,决心“因于诸侯以报仇”,这既显示了他的富于情感,又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因为只有那些无政治才能的匹夫才只能凭个人的私勇去报仇,而政治家是一定能利用他人之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接着写他历经千辛万苦而奔吴,充分展示了他的坚定性与韧性。而作者从王僚的眼中来写他状貌的非凡,也更有力度塑造了他形神兼美的形象。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小心谨慎而不急于求成。不但劝王僚不要为自己用兵于楚,就是阖闾让他当了行人之后,他仍然不敢造次行事。直到他推荐要离杀了庆忌,又推荐孙武